

· 史实考证 ·

张国焘同斯大林会见之说考

梁 化 奎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回忆录的引用需要审慎。否则，“照猫画虎”地轻信滥用，很容易把一些历史事实弄得更乱。张国焘晚年所著《我的回忆》在海内外传播很广，影响很大。对于书中记述的“1928年11月”他和瞿秋白同斯大林的会见一事^①，国内相关人物的年谱、传记，或是直接援用了其中的一些说法，或是没有提及这次会见。笔者在翻阅相关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张国焘对于这次会见所做的忆述，与事实存在有较大出入。

一、关于会见的时间

张国焘说，这次会见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谈话从“晚上九时”开始，进行了“三小时”。研读以下文献资料，基本可以判定这一说法有误。

第一，国内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以作为参照，说明张国焘这一说法有误。例如，中国问题委员会、中国问题小委员会在共产国际组织机构内的成立及运作过程，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的酝酿和起草过程等，都可以从这套丛书的相关卷本中找到文献依据。对此，后文将有详述。

第二，根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的《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以下简称《登记簿》），1928年11月初的“来客登记”中，并没有张国焘和瞿秋白的任何信息。《登记簿》由当年联共（布）中央秘书局工作人员执笔完成，对从1924年7月至1939年12月间曾经到过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各界

人物都逐一做了登记。张国焘和瞿秋白若是当年走进过斯大林的办公室，理应留下记录。

第三，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庄东晓曾在大会秘书处做翻译工作，会后留在莫斯科并进入国际列宁学校学习，与同在该校学习的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交往甚深。据她在《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回忆说，瞿秋白在莫斯科的两年多时间里（1928年5月至1930年7月），“很得斯大林的器重，斯大林亲自同他谈过三次话：第一次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期间，第二次是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第三次一九三〇年七月间”^②。这里，庄东晓说瞿秋白同斯大林曾有过三次会见，并且指出了每次会见的具体时间。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会谈的时间，已为史料证实是真实可信的^③。“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的谈话则有可能就是张国焘所忆的那次会见。然而，依照庄东晓所说的时间点查考《登记簿》，却没有任何登记信息。

第四，1929年3月12日，瞿秋白在给杨之华的一封信中，曾经说到他和斯大林的一次会

^①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23—427页。下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出于此。

^② 《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③ 第一次会见是在1928年6月9日，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和向忠发；第三次会见是在1930年7月21日，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和米夫。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77页；梁化奎《关于斯大林会见周恩来、瞿秋白的一则新史料——兼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周恩来和瞿秋白在莫斯科的活动》，《党的文献》2007年第2期。

见，并且提到参加会见的另一名中共重要领导人。写信时，瞿秋白正在南俄玛丽诺休养所疗养，他写道：昨天接到你的三封信，得知“兆征死的消息震惊得不堪”，“我党的老同志凋谢得如此之早啊”。谈到苏兆征，瞿秋白还深有感慨地说“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如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史太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的——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①这里透漏出两个信息：（1）会谈时间是在“前月”；（2）苏兆征参加了会谈。按照中国人的一般表述习惯，所谓“前月”即使宽泛地讲，也应是1929年1月或2月。而在当年2月初，苏兆征就已出现在了上海，2月25日病逝^②。邓中夏当年闻讯苏兆征病逝后，在莫斯科写了《苏兆征同志传》一文。文中说到“后因革命斗争发展，兆征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力疾回国。”^③由此可知，瞿秋白所说的这次会见时间当在1929年1月。依此查证《登记簿》，1929年1月16日15点15分，有“三名中国人”走进了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④。

综合上述几条文献资料看，当年走进斯大林办公室的“三名中国人”，理应是瞿秋白、张国焘和苏兆征。斯大林同三人会谈了约一小时（15点15分至16点25分），接着又会见了下一拨来客。

二、关于参加会见的苏兆征

苏兆征是省港大罢工时期涌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1928年6月9日，他和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就曾同斯大林有过一次会面；这次能够受到斯大林的再次约见亦实非偶然。

首先，苏兆征在中共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的突出表现，奠定了他在党内的重要领导地位。1926年5月，他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大革命后期，受中共中央的指派，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部长；中共五大时成为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

局委员，随后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不过，八七会议发布的《告全党党员书》却点名批评了苏兆征和谭平山（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部长），认为二人主持的“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没有什么区别”，“在群众面前消失共产党的面貌”^⑤。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印竟与苏兆征失之交臂，转而落入向忠发的手中”^⑥。1928年2月，苏兆征去了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其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层明确提出了改组的要求，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苏兆征的倚重因此更加突出。八七会议后中共即提出，必须“用最坚决的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⑦。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库西宁在发言中提出，未来中国党的领导干部应当“首先是由工人阶级中选拔”^⑧。1928年9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致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甚至直接提出：“由于中国党明显缺乏有威信的（个人和集体）领导”，“现在只有从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工人当中挑选中央的这种核心（如向忠发、苏兆征、项英等）”^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向各国支部党提出，由于同改良主义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大力加强革命工会的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291页。

② 参见《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5页。

③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4页。

④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81—282页。

⑥ 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186页。

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66页。

⑧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1卷（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⑨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必须“最大限度地加强这条战线的工作”^①。共产国际政策走向的这一变化，进一步凸显了苏兆征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尽管此前苏兆征因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电令公开抗议武汉政府的政策，使其工人运动领袖的形象在共产国际那里一度“大大地打了折扣”^②，但这并未改变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其的倚重。

再次，苏兆征在莫斯科的“直爽”“勇敢”表现，加深了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其的信任。在莫斯科，苏兆征先后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其思想动态从他在这些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其回国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可见一斑。如针对八七会议后党内出现的“左”的做法，他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提出“在土地革命过程中要避免抢劫、烧杀等错误做法。”^③ 1929年2月17日，在全总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对于中共一度实行的“红色恐怖”政策，苏兆征提出批评说“工会对付工贼，对付资本家，往往采用红色恐怖手段，这是错误的”；“以手枪来强迫”工人罢工，“这是脱离群众的办法，而不是群众的行动”；“我们要群众的斗争，不要枪杆的逼迫，要有组织的行动，不要做浪漫的袭击”^④。

引人关注的是，苏兆征驻留莫斯科期间曾经多次致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要求做当面汇报。1928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索洛维约夫（即赖特）曾向布哈林报告说，苏兆征“希望向您和斯大林同志汇报中国目前的形势”^⑤。同年6月5日，苏兆征和向忠发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希望执委会能够“认真对待”信中提出的“江浙同乡会”等十个问题，“最好在最近一周内作出具体决定”；信中直言他们在莫斯科“很难推进工作”，因为所有问题“都得先提交东方部，只有取得它的允许后，我们才贯彻执行”，而东方部处理得又“很缓慢”；另外，共产国际执委会内有英国问题、法国问题、德国问题等各种委员会，却没有常设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也没有常设的固定翻译；

“请求共产国际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⑥。此信立刻引起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三天后，即6月9日，斯大林约见了包括苏兆征和向忠发在内的几位中共领导人；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委员会召集会议，对于苏兆征、向忠发信中提到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如会议决定“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一名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支的常务秘书。东方部应设懂中文的技术性工作人员。远东部应设立准备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常设中国委员会。”^⑦

苏兆征对八七会议后中共党内盲动错误的尖锐批评，与其在莫斯科敢怒敢言的率真表现，不仅引起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同时给瞿秋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如前所述，他在闻讯苏兆征病逝后在给杨之华的信中说，苏兆征是中共党内“最直爽最勇敢”的工人运动领袖，其对八七会议后中共党内“左”倾盲动错误的批评给自己留下了“深切”的“教训”。对于苏兆征的病逝，瞿秋白后来常自我责备说，当初没能说服他把病治好再回去，“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⑧。

上述几点可以佐证苏兆征参加了这次会见，并在会见后旋即返回了上海。需要指出的是，苏兆征的这一重要活动，国内迄今尚未有人提及。

三、关于会见动因及会谈内容

（一）关于会见动因

依照张国焘的说法，共产国际六大后，他和瞿秋白之间在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认识

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1卷（上），第451—452页。

② 杨奎松《民国人物过眼录》，第186页。

③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I），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29页。

④ 《苏兆征研究史料》，第119页。

⑤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卷，第375页。

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卷，第470—471页。

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卷，第489页。

⑧ 《红旗飘飘》第8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第50页。

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意见。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中共应和共产国际其他支部一样“着重于反右倾”；而他则认为，中国革命新高潮并无立即到来的迹象，应遵照中共六大决议的精神，“决不可让盲动主义复活”。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争论被带到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可是经过两个月的讨论，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问题被提交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遂于“1928年11月初”约见了他和瞿秋白。

考诸史实会发现，1928年9月5日，即共产国际六大结束后的第四天，瞿秋白便偕杨之华去了南俄地区并因病发留驻在巴库疗养；11月4日，他在莫斯科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说，自己刚从南俄回来，此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都是焘兄主持”^①。另据联共（布）解密文档，同年10月28日，米夫受东方书记处委托着手组建中国问题委员会，11月12日中国问题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标志着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张国焘和瞿秋白皆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正是在这一平台上进行的。由此看来，其一，共产国际六大结束后的两个月，瞿秋白并不在莫斯科，张国焘说大会后他和瞿秋白之间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意见，显然有悖常理。其二，依照张国焘的说法，争论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依此推断，斯大林约见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三人的时间，恰好应在1929年1月。这就进一步印证了前文关于这次会见时间的考证结论。

问题还在于，斯大林缘何要在这时约见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三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提供的上述说法，是否真实可信？对此，还需要从当时共产国际的政治动向，特别是斯大林的政治关注点出发，去做综合考察。

第一，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世界革命“第三阶段”理论^②，使其在指导中共从纠“左”转向反右的过程中，陷于棘手而又十分尴尬的境地。历史地看，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做出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即认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

到来，强调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③。然而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世界革命“第三阶段”理论，却引发了中共思想认识上的再度混乱。如布哈林提出，“通观共产国际整体，则当前右倾是主要危险”，“种种客观迹象证明，革命高潮必然到来”；并认为，现时中共党内的错误倾向“是右比‘左’更甚”^④。会后，共产国际为了加强对中共的指导，任命库西宁为东方书记处书记，米夫为东方部部长，并在东方部下组建了中国问题委员会。米夫在中国问题委员会成立会上宣布说：“我们给这个中国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预先仔细研究与中国工作有关材料，以便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经常性的、定期的和系统的指导。”米夫还做出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要对两个六大就中国问题做出的原则性决议做出“根本性的修改”，但是应当看到，对于这期间中国发生的许多事件，有必要及时做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这是指导中共的基础。^⑤可是究竟应当予以怎样的指导，对于共产国际来讲，是个依违难决的问题。是引导中共继续纠“左”，还是推动其积极反右？显然，这已不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可以自信地做出回答的问题。张国焘在回忆中说，在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争论问题曾被不断讨论，可是“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还是不能作具体的解决”。其中的原因就在这里。于是问题被提交到了联共（布）最高领

-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第174页。
- ② 这一理论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共产国际六大召开，世界革命形势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1923年，是无产阶级采取直接行动的阶段；从1923年8月至1927年，是资本主义制度趋于稳定的阶段，也是无产阶级由进攻转入防御的阶段；从1928年起，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崩溃动摇的阶段，也是世界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1卷（上），第435—436页。
-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15页。
- 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1卷（上），第253、255、256页。
- ⑤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8卷，第38、39页。

领导人，亦被认为是中国问题头号专家的斯大林那里。

第二，共产国际六大后，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内不断祭出反右大旗，打断了中共的纠“左”进程，并将其强行拨向了反右。1928年7月，在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斯大林同布哈林集团之间的矛盾公开暴露出来，后者在国家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意见被指是“右倾”。在当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里，斯大林以反右为主题，相继做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三个重要演说。他在第一个演说中指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现在已经“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来”，党的任务“要着重反右倾的斗争”；而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则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①。第二个演说是将他在上个演说中所阐述的反右观点，借由联共（布）中央十一月全会进一步在全党范围内传播。斯大林在第三个演说中说：德共中的右派分子和调和分子正在“从内部瓦解党并威胁党的生存”；同时斥责意共领导人塞拉等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已经“滚到怯懦的机会主义的泥潭里去了”。斯大林还对“第三阶段”理论中所谓资本主义由稳定到“稳定的动摇”的提法做出解释说：“这就是说，稳定现在已经动摇和不巩固了，它在第三个时期的条件下将更加动摇。”因此，这一阶段中，“工人阶级的斗争往往带有遭遇战的性质，带有向资本家反攻和正面进攻的性质”。斯大林强调指出“当右倾分子正在散播社会民主党腐朽的思想毒素并且不断破坏党的纪律的基本原则，而调和分子还给右倾分子帮忙的时候，继续容忍这种‘秩序’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要求。”^②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高调反右，使得共产国际在如何指导中共的问题上终于有了

最明确的答案。

第三，在斯大林演说《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过后一个月，共产国际起草了要求中共着力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指示信。1929年2月8日，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讨论这个指示信草稿的会议上发言说“中国党的全会快举行了，因此起草了要致全会的信”；“这封信只确定总的方针，就是从策略角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如何评价形势。丧失革命前景的危险越来越明显。”这里，所谓“中国党的全会”是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库西宁还提出“我想建议现在把信的草稿作为基础。有些地方需要再看看。可能为此需要建立一个不大的委员会。我还没有收到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想在最后审定时也要考虑他的意见。”据此会议做出决定“责成由库西宁（负责人）、斯大林、米夫和格列尔同志组成的小委员会作最后审定。”^③这则史料表明，指示信早在2月8日前的一段时间即已完成并呈送斯大林审阅。由此推断，斯大林1月16日约见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三人之时，应当正是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起草之际。瞿秋白和张国焘皆参与了起草工作^④。这就凸显了此次会见与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时任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部长的格列尔能够成为最后审定指示信的四小委员会的成员，反映出斯大林对于加强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的高度重视。这也是苏兆征受约走进斯大林办公室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上述三个相互关联的历史因素看，中共六大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联共（布）党内政治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1、65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54、255、257、260页。

③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8卷，第65、75、76页。

④ 瞿秋白在1929年3月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国际已有一中国问题决议，我亦是积极参加的（虽因病未能自己起草）”。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第293—294页。

斗争的溢出效应，使得反右斗争逐渐成了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党政治生活的主题。在把这一斗争直接指向西方各支部党的同时，如何将反右引入尚在强调纠“左”中的中共这个共产国际中的第二大支部党，成为斯大林当时所关注和思考的特定问题。因此，他约见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三人，实际上是要了解给中共中央的新的指示信的起草情况，并借此征询留驻在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对在中共党内开展反右斗争的态度和想法。其后正式发出的、以强调反右为主旨的指示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二）关于会谈内容

从前文的考论已不难看出，斯大林同三位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内容，大抵会涉及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中共党内的右倾危险、对待右倾及调和分子的态度、“第三阶段”理论下的工人运动等。吊诡的是，这些在张国焘的回忆中不但没有相应的记述，反而能够看到这样的说法：瞿秋白向斯大林“报告了一些东方部最近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的大要，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予以指示。谁知斯大林却淡淡的回答说：我认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够了，现在我没有什麼新的意见。斯大林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使瞿秋白反右倾的调子，不能不大打折扣”。在当时斯大林措辞激烈地高调反右，整个共产国际也在闻风而动的背景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提供的这些说法，显然值得怀疑。究其原因，问题出在张国焘在忆述这次会见时，把自己置于了代表党的正确路线的位置上，俨然是一个勇于站出来反对开展反右斗争的中共领导人。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后见之明。这种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做法，极大减损了《我的回忆》的史料价值。

引人关注的是，张国焘在回忆中还说了他和斯大林之间的一段对话。斯大林问“像宋庆龄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城市的街上，遇见一个共产党员，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接着又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在得到两个否定的回答

和说明之后，“斯大林的神情，似对我的意见颇为满意，也许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共今后的决策有重大的关系，因为前者的答案，表示中共还有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同盟者，后者的答案，表示陈独秀并不能在中国作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力活动”。

上述“斯大林之问”迄今还没有发现能够佐证其真实性的文献资料，这使得张国焘的说法成为孤家之言。然而，就是这一孤家之言，国内外相关著述却竞相“照猫画虎”地做了引用，以此作为论说是非的依据。问题似乎还不在于“斯大林之问”是否为孤说，而是张国焘是否真的领会了“斯大林之问”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斯大林大约是想借此了解将要在中共党内开展的反右斗争，以及这种斗争所包含的反对“第三党”的斗争，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和影响。事实是否如此呢？如前所述，1928年12月19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曾针对德共党内的右倾问题发表演说指出，德共现在还没有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党内右倾分子客观上已经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代理人”^①。共产国际则把斯大林的这一反右观点机械地搬到了中国。它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提出，谭平山等领导的“第三党”客观上“已成为国民党的工具”，因此应当特别注意“揭破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假面具”；同时指责中共说“在中国党中央的一切通告中，我们没有看见一点关于反对他们的特殊指明，没有看见与这种反共产主义团体的斗争。”^②这就明确表明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于“第三党”的态度和立场，也说明斯大林的第一问更有可能意在反右。

再来看斯大林的第二问，共产国际六大后，早在1928年初已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的活动，特别是其追随者在莫斯科同布哈林集团等反对派的串联活动，包括中国留俄生中的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65—266页。

^②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11卷（上），第491页。

托派活动，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警觉。1928年12月16日，即托洛茨基被逐出莫斯科一年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会全权代表沃伦斯基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向托洛茨基发出最后通牒，称托洛茨基与其“志同道合者”近来的活动具有“反革命性质”，要求托洛茨基绝对保证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否则将不得不改变其“生存条件”，使其“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在遭到了托洛茨基的明确拒绝之后，1929年1月18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召开局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指控托洛茨基“从事反革命活动”，“组织非法的反苏政党”，“旨在挑起反苏行动并准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因此决定将其“驱逐出苏联”。^①1月20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向托洛茨基宣布了这个决定并将其驱逐到了土耳其。与此同时，中国留俄生中的托派活动特别是其与国内陈独秀反对派的联系，使得斯大林对于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这样两个“捏笔杆子”

的反对派的联合，不能不有所忌惮。“斯大林之问”的真实动机和意图，或许就在于此。而其后陈独秀之于托派的关系，不能不说也证实了斯大林的这个顾虑。

总之，从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政治风向的嬗变来看，对于张国焘所述自己同瞿秋白之间的争论，特别是其在同斯大林会见之时的言行表现，斯大林是不会流露出“颇为满意”的神情的。也就是说，张国焘对于这次会见的记述不但时间上有误，其对会见动因及会谈内容的说法，也有悖于历史事实。

(本文作者 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教授 徐州 221111)

(责任编辑 赵 鹏)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05、510页。

(上接第36页)例如，好莱坞电影被全面禁绝之后，暂时弥补片荒的西欧电影在内容上也配合着新政府的步伐。《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偷自行车的人》《罗马11时》则反映了二战后意大利失业工人的悲惨境遇，这些题材都从不同侧面印证着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

另一方面，以组织化、政治化和大众化为时代特质的大众娱乐，成为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并非自然而成。它是特定政策导向、工作方法和时代背景共同孕育的产物，是新政权在意识形态建设探索过程中，政治历史观念和伦理情感生活高度符号化的结果。由于政治性的深度介入，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大众娱乐原有的娱情属性被削弱，转而成为政治建设的助推器，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大众娱乐发展的僵化。大众娱乐的改造旨在提高民众的政治参

与度，不过，政治化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娱乐活动的吸引力，其效果注定无法持久。在延安革命文化、苏联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碰撞中，海派文化一度“失守”；但轻易地将1949年看作新旧文化的分水岭却过于武断，50年代后期承载着旧上海回忆的香港电影受到上海市民的热捧^①，以及广泛弥漫于市民中间的怀旧情绪都足以说明，在新中国大众文化的强势转型中，原有的文化并未完全断裂，海派文化的张力低调却顽固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

(本文作者 杨丽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062；陈庭梅，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历史系教授 温尼伯 R3T 2N2)

(责任编辑 赵 鹏)

^① 张济顺《转型与延续：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西方的反应》，《史林》2006年第3期。